

民国时期德国在华 外交机构、宗教势力 及侨民情况

房建昌

摘 要: 本文主要据笔者在德国搜集的天主教圣言会史料及在日本搜集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对在华德国势力的调查资料,叙述民国时期德国在华外交机构、宗教势力及侨民情况。同时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一书作出一些补充和纠正。

关 键 词: 民国时期; 德国在华使领馆; 天主教; 侨民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6

中图分类号: D82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01)03-0061-04

在我国,与民国时期的中美、中英及中法关系的研究和史料整理相比,中德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十分薄弱的,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史料,因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3万字)的出版,无疑是对今后这方面研究的一大促进。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珍贵史档汇编缺乏以下四点十分重要的史料:1. 1927-1947年间德侨在华情况,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对德侨的处理。2. 德国在华使领馆的分布及主要驻华外交官。3. 德国在华的文化和宗教机构设施。4. 德国与伪满及侵华日本势力的关系。显然是因二档本身不藏;特别是德国与伪满关系的史档自然是在东北收藏。此前,笔者应在中国大陆传过教的、并至今仍在台湾传教的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邀请,赴德国讲学,搜集了一些民国时期,即1945年前德国驻华使领馆的档案文献;又有机会在北京和东北见到了不少侵华日本军政机构对在华德国势

力及德侨的调查报告,后来又多次应邀赴日本讲学,搜集了更多的日占时期的史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已决定对英美等国在华势力下手,但西方在华经济势力,特别是宗教势力往往纠缠在一起,所以要下大力气分析清楚。比如说德国在华的最大天主教势力是圣言会,该会在山东的神父因为与当地民众的矛盾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换上了美国的该会牌子。

关于日本人所作上海德国犹太难民的调查报告,大家知道,1938-1939年是这些难民来华的高潮期,实际上,当时上海能收留犹太人主要是得到了侵沪日军的同意,因为日军认为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经济。为了获得美国的军用物资,日军要利用这批犹太人。当时日军最需要的废铁就是美国犹太商人提供的。

日本对在华德国人口历年有详细的统计,在上海,详细到每个区的分布。对德人在华所办报刊则

记述中外名称、地址所在、内容特点及发行人和发行数目。对德国在华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教派则详述来华历史、分布及人数,还有所办学校和医院等。至于对德国在华工商势力的调查则更为详细。

兹根据上述资料,并参照其他史料分述有关情况如下:

一、1947年前德侨在华情况

关于德侨人数,《中德外交密档》第490-493页收录了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德国在华经济势力调查》(1940年)的数字。这是汉文译件。笔者核对,实际上乃译自日文书名为《独逸对支经济势力之全貌》(日本外务省通商1940年10月序,外务省调查部编纂,1940年11月,东京,日本国际协会发行)所附“独逸对支经济势力一览表”。该表在数字前已注明,为1936年在留人口。那么,1940年前后在华德侨的人数有多少呢?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三课编《中华民国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口概计表(昭和十六年四月一日现在)》的截止1941年4月1日的统计为:总计3762人,北部为1369人(主要在天津459人,济南332人,青岛266人,北京202人),中部为2252人(主要在上海2000人,汉口125人),南部为241人(集中在广东[即广州]191人)。上海犹太人25000人。实际上,上海25000名犹太人中有约近两万名是从纳粹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难民,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因此前奥地利已被德国吞并,故无法区分,但其中出自德国的约有15000。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编《中华民国在留邦人及第三国人口概计表(昭和十八年第四报十月一日现在)》的截止1943年10月1日的统计为:总计4970人,北部为2137人(主要在北京475人,天津640人,青岛484人,济南363人),中部2605人(主要在上海2439人,汉口107人),南部(主要在汕头125人,广东[即广州]89人),犹太人16862人(其中北京62人,山海关13人,青岛29人,上海16749人[德系、俄系和波兰等统算在一起],南京5人,九江4人)。

二、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对德侨的处理及宗教势力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收藏的《中国战区、中

国陆军总司令处理德侨文件汇编》(打印本,止于1946年4月)收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1945年9月“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处理德侨办法及有助日为恶行为者须受我国制裁件”,内命令:“德国派驻伪组织之人员及在华德侨,速令集中管理,加以监视,如助日为恶,经查明确有违法行为者,均须受我国法令制裁,除分令外,希即照办。”

同时司令部又有“电各省市军政长官,德侨及德国派驻伪组织人员一律令入集中营件”,内命令:“查德国派驻伪组织之人员及在华之德人,应一律集中居住,加以监视,不得任其在外活动,又此项德人,何者为纳粹份子,何者非纳粹份子?并应确实调查具报。南京、上海两市,由各该市政府办理;其他各地,由各区受降主官办理。除分电外,希即迅速办理具报。”

南京市政府随即呈报了所颁布的《南京市德侨集中营管理办法》。

不久,又有“电各省市军政长官,监护德籍教士补充规定件”:“奉委座电:据天主教教宗驻华代表,请求予在华全体德籍教士以自由与保护,本人愿负全责,保证渠等行动,给予特别证件等情。奉飭妥为核办等因。查德国派驻伪组织人员及德侨集中管理,业经本部分电照办,兹补充规定如下:(一)教廷所派德籍传教士,如无军事政治关系,未有间谍行为,非纳粹份子者,准仍居教堂,由各地政府监护。(二)德侨中过去有助于我抗战者,由各地政府另予居住监护。(三)德侨中专科医师及技术人员,为各事业机关需用者,得准征用服务。除呈报及分电外,希查照办理并报。”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办的中文刊物《圣心报》1946年第1期报道: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宗座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总主教,重庆尚主教及吴经雄陪同。蔡宁当时是天主教在华最高领袖,他亲自向蒋介石请求获准,不仅使德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得以留存,而且连带保存了德国新教在华势力,更使对驱逐德侨加以区别。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有山东沂州府、曹州府、青岛、兖州府四教区,河南省的新乡、信阳州两教区及甘肃省的兰州府教区。另外新疆及青海虽为该会布道区,但在盛世才当政时期,新疆的天主教德国神父被驱逐或入狱,此

时尚未恢复;而青海的天主教仅限于西宁府地区。圣言会在上海有总堂机构,在北京有辅仁大学等机构。其他德国系天主教教派势力有:1.美国芳济各会山东省周村(张店)、济南两教区及山西省绛州和朔州两教区。2.救世主会福建省邵武教区。3.伊索达会贵州省石阡教区。4.多明我会福建省汀州教区。5.嘉布遣会甘肃省秦州教区。

当时德国在华的新教势力也不弱,主要教派及传教地点为:1.巴色会(巴塞尔基督教传教协会,路德宗),广东省。2.礼贤会(莱茵兰传教协会,路德宗),广东省。3.巴陵信义会(柏林传教协会,路德宗),山东省;另有巴陵女书院。4.同善会(大众基督教新教传教联盟),山东省。5.德国喜迪堪会。6.北海长老教会。7.粤南信义会。8.肥柏基督教会。加上其他支派总计有10多个。在这方面,李乐曾先生已在《德国研究》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重要的成果,读者可以参看。

可以看出,德国新教在华势力大致与天主教各掌南北,而在山东会合。

关于战后国民党对广州地区德国敌侨的处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记述》(广州,1946年6月15日,16开本)第133-134页有所记载:其中间谍嫌疑犯,大都由美方检举,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逮捕后,遵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暨外交部之指示,将人犯案件一并移交广东高等法院处理。

姓名	年龄	级职	
伊立治·海斯	54	“海斯机关”首脑	
海司·门尼	26	谍报工作电报员	
奥司华·欧不力士	32	谍报工作电报员	
奥都	53	广州河南红十字会医师	华南纳粹党首领
卡尔·西弗	34	华南财务秘书	
弛里治·泼区纳治	52	工程师	
弗来斯·西勃特	66	德驻广州领事	
格里治	38	德领事馆副领事	
柏立桑	38	德领事馆书记	
海特·华特立治	44	德领事馆职员	
弗莱特立治·施勃特	50	教士	
海泼而克	60		热心纳粹工作者

上述纳粹战犯在逮捕后,以案情重大,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电令指示,已将要犯海斯、尼门、欧不力

士、奥都、西勃特、格里治、柏立桑等7名就地交美方解沪审讯;其余西弗、泼区纳治、华特立治、施勃特、海泼而克等5名仍留广州由高等法院办理。

1945年10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市德侨管理委员会,派杨志成成为主任委员,12月19日杨在招待本市记者参观江湾其美路(今四平路)集中营(前日本小学)时言全沪德人约计2300人。28日颁布了“上海市处理德侨办法施行方案”,在1946年7月7日送走一批德侨后上海市德侨管理委员会即行结束。至于此次未及遣送之少数德侨,定于1947年2月16日遣送回国。

三、1945年以前德国在华使领馆的分布 及主要驻华外交官的情况

1913年10月6日,德国驻京公使致函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35年5月8日,使馆升格,为大使级。

历届使节为:钦命全权公使哈豪森(E. von Haxthausen):1913年11月13日呈递国书。

辛慈(Paul von Hintze):1915年1月18日到任,1917年3月25日离任回国。

署理公使卜尔熙(Herbert von Borch):1921年7月13日到任。

特命全权公使博邨(Adolf von Boye):1921年11月26日到任。

卜尔熙:1928年受任,1929年6月3日到任,1931年2月12日应召回国。

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1931年10月2日到任,1935年9月14日任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因德国于1938年2月20日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纳粹政府于同年6月25日下令陶德曼受召回国。

暂行代办(参事):飞师尔:1938年6月25日受任,实际代行大使事。

1941年7月1日,德承认汪伪政府,飞师尔任公使衔代办。

1942年1月19日,德国驻汪伪首任大使史塔玛(Heinrich Georg. Stahmer)到任。1943年1月3日,由科尔特代理驻汪伪大使。

1943年8月5日,德国驻汪伪第二任大使,也就是最后一任大使韦尔曼(Ernst Woermann)向汪伪

政府递交国书。

1945年5月德国投降,6月,德在华各使领馆如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芝罘及伪满境内的新京、奉天、哈尔滨及海拉尔领馆均停止馆务。7月,各改设为德国事务局。

民国成立时,从清朝延续下来的在北京外的领事馆如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香港、澳门、成都、重庆等26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葡日先后对德宣战,港澳的德国领事馆均撤消,1917年中德断交,在大陆的德领馆亦均撤消。1921年中德恢复邦交前后,在大陆恢复了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11处领馆,后又增设西安等几处领事馆。

鸦片战争以后,德国商人开始在沪立足,1854年,德国开始在沪设领事馆,1878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民国年间德国驻沪总领事馆人员情况为:

卜利(Paul Buri),1911年时在任。

尼伊(G. Ney),1913年7月14日代总领事。

克理平(H. Knipping),1914年1月12日上任,1917年9月18日离任回国。

梯埃尔(Fritz Thiel),1921年上任,1926—1927年前后升为总领事。

克伦堡(Ruth [Rudt] von Collenberg),1932年2月在任。1933年12月,克伦堡的总领事职位由亲纳粹的贝伦德(Richard Behrend)领事代理,1935年10月2日贝伦斯(Behrens)为代总领事。

布拉克洛(E. Bracklo),1939年8月10日在代总领事任上。

飞师尔,1939年上任,1941年5月还在任上。

青塞尔(Christian Zinsser),1941年在总领事任上。

博尔歇斯(Dr. Johannes Borchers),1941年在总领事任上。

四、对《中德外交密档》中的一些问题补正

1.《中德外交密档》前德方人员名单第5页有爱尔哈德(Ehrhardt),言为国防部参议。又收有马振铎先生所译美国记者马丁一报告,内第104页有“德

国间谍机关爱尔哈德(Ehrhardt)局”。所提到的Ehrhardt的大致情况是:

据青年德国犹太难民海培耐尔(Ernest G. Heppner, 1921年生)所著:《上海避难》(Shanghai Refuge, 美国, 1994年)第43页言,在此期间,上海雅利安德侨社团是反犹的,该社团大多数设施在法租界,有一德国教堂、一俱乐部总会、一德语电台、一定期出版的纳粹报纸《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 Lloyd)。有自己的德国商会,一个盖世太保办事处。其中有远东特工头子爱尔哈德陆军上校(Colonel Ludwig Ehrhardt, 别名钢梁[Lothar Eisenträger])。

2.《中德外交密档》第521页收有德国向汪伪赠送在沪放送电台Seder XGRS设备档案件。放送是日文广播意。Seder德文是广播电台意。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该广播电台,该台位于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德国威廉学堂(Kaiser Wilhelm School)附近,有长短波,用几种语言向亚洲和澳大利亚播放。广播员有美国人和其他亲轴心国合作者。

3.《中德外交密档》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在此应当指出,如前面德方人员名单第4页的飞师尔并未出任过驻汪伪大使,最高仅任过公使衔代办,且与名单第5页的驻上海总领事费希为同一人,译法不同而已。另第453页载1937年德人师弗尔(sckafte)来华考察西部事。但名字错了,此人姓名为Ernst Schaefer, 1910年生。此人详细见笔者1997年在《德国研究》1997年第1期发表的《1939年希特勒派往西藏的使节》一文,兹不赘述。还有一些印刷有错误,如编辑说明第2页的德国洪堡大学的Peter MerRer与第515页下注的Peter Merker为一人,第2页的德文名字印刷错了。德方人员名单第5页的鲍尔(Bouer)为Bauer之讹。另第521页的天京应为天津。

限于篇幅,我们对上述德国资料和日本调查报告中有德国在华的文化和宗教机构设施及德国与侵华日本势力的关系的记载将另撰文叙述。

责任编辑:肖友瑟

Gemeinderechtsausschuß stelle den Geist des Rechtsstaats, der Mitregierung des Volks durch Vertretung und der Demokratie dar.

Kurzer Überblick über Öffnung der Rechtsdienstleistung Deutschlands und ihre Aufklärung

Wang Jiang

In der deutschen Rechtsdienstleistung wird die fortschreitende und beschränkte Öffnungstaktik durchgeführt. Dabei werden die Grundregeln von WTO eingehalten, und Schritt für Schritt wird ein Satz Regeln über Praktizierung des ausländischen Rechtsanwalts in Deutschland erstellt. Mit Eintritt in die WTO wird China den Markt von Rechtsdienstleistung weiter öffnen. Die positive Erfahrung von Deutschland bietet uns eine Aufklärung.

Skizze der Rechtskultur Deutschlands

Guo Shuli

Die Eigenheit der Rechtskultur Deutschlands lautet: Prozes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Professionalisierung der Rechtsschichten, Systematisierung des Rechts und Rechtsbewußtsein der Öffentlichkeit usw. .

Deutsche auswärtige Vertretungen, religiöse Kräfte und Staatsbürger in China in der Zeit von der Republik China

Fang Jianchang

Aufgrund der geschichtlichen Materialien der katholischen Mission und japanischer Untersuchungsmaterialien über deutsche Kräfte in China in der Zeit vom japanischen Aggressionskrieg in China, die der Autor in Deutschland bzw. in Japan gesammelt hat, stellt der Artikel deutsche auswärtige Vertretungen, religiöse Kräfte und Staatsbürger in China in der Zeit von der Republik China dar. Gleichzeitig macht der Artikel ein paar Ergänzungen und Korrekturen für das vom 2. Geschichtsarchiv Chinas zusammengestellte Buch „Geheimdokument der chinesisch-deutschen Diplomatie (1927–1947)“.

Nachruf auf Hans Mayer

Song Jianfei

Im Alter von 94 Jahren ist Hans Mayer, der Nestor im deutschen Literaturkreis, am 19. Mai 2001 gestorben. Hans Mayer erlebte fast alle wichtigen literarischen Ereignisse im 20. Jahrhundert in Deutschland mit. Er war durch seine besondere Lebensgeschichte und eigenartige Begegnung mi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m In- und Ausland sehr bekannt. Mayer war Jude,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und -kritiker, Marxist, Germanist, Professor, Schriftsteller, Polemiker und Gesprächspartner. Sein glückliches und unglückliches Schicksal stand exemplarisch für die Widersprüchlichkeit und Tragik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Den vorhandenen Artikel schreibt der Verfasser zum Nachruf auf den verstorbenen Freund.

Maßnahmen von Deutschland gegenüber Konkurrenz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Auslandsbildungsmarkt und deren Aufklärungen

Ye Jun

Der Artikel stellt näher verschiedene aktive Maßnahmen vor, die die deutsche Regierung und Kultusinstitutionen ergriffen haben, um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Auslandsbildungsmarkt eine günstige Stellung zu besetzen.